

第一章 西部民族地区经济是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

我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多民族国家。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一贯坚持民族团结，民族平等和各民族共同繁荣的民族政策。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中国人民在建设社会主义国家的伟大事业中，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在国家的大力帮助下，少数民族地区不仅完成了社会制度的伟大变革，走上了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而且各项建设事业也获得了巨大的成就。但是，我国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特别是少数民族地区，经济、文化发展仍较落后，与发达地区相比存在不少差距。为了进一步加快少数民族地区的四个现代化建设，党和政府明确规定了民族工作总的指导思想和根本任务：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的基本国策，紧密结合少数民族地区的少数民族的实际，从民族平等、民族团结、民族进步、相互学习、共同致富出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全面发展少数民族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不断巩固社会主义的新型民族关系，实现各民族的共同繁荣。党的十四大报告又进一步指出：“加快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的发展，对于加强民族团结，巩固边防，促进全国经济发展，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

少数民族地区经济也取得了长足的进步，由于国家在地区生产力布局上实行梯度推进的经济发展战略，东部地区、中部地区和西部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的非均衡增长构成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国民经济区域发展的基本特征，国家在“七五”计划中把整个国土从经济上划分为东部沿海地区、中部地区、西部地区，提出了区域发展规划——东部采取“加速发展”的战略方针，中部采取“加快开发”的战略方针，西部则是采取“加紧准备”的战略方针。按照这种划分来制订不同经济区域的经济发展战略规划，不仅有利于从各地区的不同实际情况出发，发挥各自的优势，而且也有利于把东部沿海的发展同中部、西部的开发很好地结合起来，做到互相支持、互相促进。但是，区域经济的倾斜发展，使长期形成并在解放后逐步缩小的东西部经济差距又被迅速拉大，并相应产生了一系列区域或整体性的社会经济问题。进入 90 年代，必须重新认识西部少数民族地区在国民经济发展中的地位，采取切实措施弥补“地区倾斜”经济发展战略的不足，实施“适度加速发展”西部少数民族地区的开发战略，迅速推进西部少数民族地区的资源开发和经济增长，以逐步协调东西部地区经济发展关系，实现生产力的合理配置和地区经济的协调发展，促进国家经济结构的调整和优化。

一 中国经济发展的巨大成就和现阶段发展面临的问题

新中国的经济发展，是在旧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经济的基础上起步的。旧中国的经济基础十分薄弱，基本上是一个

封闭的、小农经济的落后国家。仅有的一点现代工业，其规模和生产水平都极其有限，就是这极其有限的现代工业，到解放前大部分为官僚资本所垄断，民间企业基础十分薄弱，再加上连年的战争破坏，工农业生产凋蔽，人民的生活处于极其低下的水平。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的经济面貌，无论是在经济制度和经济机制方面，还是在生产力和整个经济的发展方面，都经历了巨大的变化。40年来，中国进行规模巨大的经济建设，1950年到1988年累计，全民所有制单位固定资产投资总额达21583亿元，有4393多个大中型项目建成投产，新增固定资产15619亿元，与1949年相比，工业固定资产原值增长了50多倍，煤、电、钢铁、纺织等工业的生产能力几倍或几十倍地增长，同时，还建立了一系列新的工业部门，初步形成了门类齐全的工业体系。在农业水利建设上，农田有效灌溉面积达到4460多万公顷。农业机械发展到拥有农机总动力2658亿瓦特。铁路、公路、水运、空运能力以及邮电通信等基础设施能力也有了迅速的增长。

在大规模建设的基础上，社会生产得到很大的发展。从国民经济恢复完成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之年—1953年算起，到1988年，平均每年的增长速度：社会总产值为8.8%，国民收入为6.9%，工业总产值为11.7%，农业总产值为3.8%，社会商品零售额为9.6%。外贸方面，1988年进出口总额比1950年增长90倍，其中出口总额增长85.4倍，进口总额增长94.3倍。

随着经济实力的增长，我国科学教育事业也有了很大的发展，1988年，全民所有制单位的自然科学技术人员达960

万人，比 1952 年增长了 20 余倍，许多重大科技项目都达到或接近世界先进水平；1988 年，全国大、中、小学的在校学生数分别为 1949 年的 17.7 倍，39.2 倍和 5.1 倍；国家用于科学、文教卫生事业的费用，1950 年为 5.02 亿元，占当年财政支出的 7.4%，1987 年则达到 405.57 亿元，占当年财政支出的 16.7%。1988 年和 1989 年，国家用于这方面的财政支出又有了进一步的提高。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城乡人民生活有了显著改善，全国居民每人每年的实际消费水平 1952 年为 76 元，到 1988 年提高到 639 元，扣除物价上涨因素，平均每年增长 3.7%，绝大多数人已解决了温饱问题，一部分居民开始向小康水平迈进。

从总体上看，40 年来中国的经济发展大体上可以划分为两个时期，前 30 年（1949—1978）受政治因素的影响，起伏动荡比较剧烈，后 10 年（1979—1988）比较健康，我国的社会总产值从 1953—1978 年平均每年增长 7.9%，而在 1979—1988 年平均每年增长 11.3%，国民经济收入平均每年增长则由前 25 年（1953—1978）的 6% 提高到后 10 年的 9.3%，后 10 年居民人均生活费收入平均每年增长 6.5%，大大高于前 25 年平均每年增长 1.6% 的幅度。可以说，后 10 年是中国经济发展生机最为旺盛，经济实力增长最快，人民得到实惠最多的时期，而这 10 年也是中国经济体制经历第二次重大变革的 10 年。后 10 年中国经济发展的更大成就，是同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推进息息相关的。

在中国经济发展的历程中，经济体制经历了两次重大的转变。

第一次重大转变是在建国初期，对旧中国的半殖民地半

封建的经济制度进行根本的改造，确立了以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为主要形式的社会主义公有制结构，建立了集中统一的计划经济管理体制，这种经济体制是一种高度集中统一的、排斥市场机制的、主要以直接的行政手段来进行调节的体制，这种体制的建立有其客观上的理由，对经济发展也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中国经济的第二次重大转变始于 1978 年 12 月召开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全会是一次历史性的伟大转折，总结了我国经济发展的历史经验，拉开了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帷幕，经过 10 多年的改革，中国经济体制的格局发生了重大变化。

在所有制结构方面，开始由单一的公有制向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所有制结构转变。国有经济的比重下降，非国有成分比重上升。例如，在工业总产值中，从 1978 年到 1988 年，国有经济从 80.8% 下降到 64%，集体所有制经济从 19.2% 上升到 32.6%，其中乡办企业上升到 14.1%。包括个体经济，私营经济、中外合资及外商独资等在内的各种经济成分，1978 年几乎为零，1987 年增加到 2.4%。

在企业机制方面，特别是占产值、利润、税收比重较大的国有企业，开始由政府部门的附属物逐渐向自主经营的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转变。通过“放权、让利”，企业的财务、人事、供销等方面的自主权有所扩大，改革前企业留利不到 5%，1987 年达到 45%。目前正在通过建立现代企业制度，逐步达到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以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为目标的全面改革，正在起步。

在市场机制方面，改革前市场的范围局限于一部分消费品，改革以来开始逐步扩大到生产资料和各种生产要素。现在，农副产品市场和工业消费品市场已初步形成，生产资料市场和短期资金市场有了一定的发展，技术、信息、劳务、长期资金市场和房地产市场也开始形成。1988 年价格由市场决定的产品，在农副产品中约占 65% 在工业消费品中约占 55%，在工业生产资料中约占 40%，总的看大约有一半商品价格已经在不同程度上由市场调节。

在政府对经济的管理上，开始由直接的行政协调为主逐渐向以经济手段为主的宏观调控转变，国家指令性计划管理的产品和统一分配的物资品类大大减少。在全社会生产建设资金中，政府财政拨款和银行贷款比重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前者从过去占 3/4 以上，下降到 1/3 以下，后者从过去不到 1/4 上升到 3/4 左右，金融手段以及价格等经济杠杆在调节社会供求方面的作用有了增强，为实现管理逐步转向宏观调控提供了条件。实践告诉我们，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通过市场配置资源，既要尊重价值规律，又要注重宏观调控，以保证总需求与总供给之间的平衡。

在内外经济交流的格局方面，开始从封闭、半封闭经济逐渐向开放型经济转变，开放包括对内和对外开放。国内经济在改革前由于政企不分，企业所隶属的中央行政部门或地方政府部门都力求在所管辖范围内自成体系，形成了部门之间和地区之间的封锁和分割。10 年来，对分开政企职责、打破“部门”、“地方”分割，进行了一些探索，发展各种横向经济联合。据统计，全国已形成 49 个跨省区的横向经济网络，近 4 万个工商联合体和 100 多个大型工业企业集团。

在对外开放方面，1979年中央决定广东、福建两省实行灵活政策，特殊措施、对外开放；1980年决定兴办深圳、珠海、汕头、厦门4个对外开放经济特区，1984年春开放沿海14个港口城市和海南岛；1985年春决定开放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和闽南三角地区；1986年以来陆续开放山东半岛和辽东半岛，1988年春决定建立海南省并将其作为最大的对外开放的经济特区，在广东、福建建立范围更大的改革开放试验区；同时制定了沿海经济发展战略，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10年来，全国通过各种方式实际使用国外资金累计达477亿美元，已批准的中外合资、合作经营和外商独资经营企业已近1.6万家。进出口货物总额1988年达到1028亿美元，比1978年的206亿美元增长了4倍，对外开放在中国经济发展中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经过10年改革，中国原有的僵化、封闭的中央集中计划经济体制，逐渐向具有活力的、开放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化。党的十四大报告进一步打破了传统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条条框框，充分肯定市场、市场关系、市场机制在社会主义经济发展中的重要地位，明确社会主义经济是市场经济，强调要进一步发展商品经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体制。完全突破了旧体制和僵化观念的束缚，为社会主义的充分发展奠定了思想理论基础。

40多年来，中国经济发展的成就确实是显著的，这些成就的取得，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艰苦奋斗的结果。在取得这些成就的同时，中国经济发展仍存在一些问题，其中，产业结构失衡是当前中国经济发展中的突出问题，农业、交通运输、能源和原材料等基础产业和基础设施发展滞

后，供给与需求之间存在着巨大缺口，基础产业落后已成为实现国民经济持续、稳定和协调发展的严重障碍。

1985年以来，由于对农业形势盲目乐观，采取了一些削弱农业的措施，出现了5年的农业徘徊。5年来工业生产年平均增长17.5%，而农业仅为3%，粮食、棉花等产品产量增长很少或有所下降，而且掠夺式的经营使地力下降，生态环境严重恶化，农业发展的前景十分严峻。

工业生产内部结构不协调状况日益严重，产业、产品、技术、企业规模等不协调比前几年更突出，特别是加工工业发展过快，原材料短缺、能源紧张的局面严重制约着生产的稳定发展和经济效益的提高。1984年以后，加工产业的增长一直超过基础产业的增长，轻工业在前几年得到迅速发展以后，其发展速度仍比重工业高两个百分点。在重工业内部、加工工业又以每年高于原材料工业3个百分点的速度发展。1988年原材料、采掘工业的负担比1978年加重了30%，比较为正常的1983年加重了40%，能源生产弹性系数为0.4，低于“六五”时期0.61的水平，差距不断扩大，使得我国工业生产对进口的依赖程度大大提高，近几年进口用汇的80%被用于购买相当于国内产量的40%的国外产品。同时，各地区产业结构趋同。各地区的发展都追求自成体系、搞“大而全”、“小而全”。原料产区在加紧发展加工工业，沿海为了解决原料不足问题则在千方百计发展能源和原材料工业，结果不是各自发挥自己的优势，而恰恰是发展了自己的短处。

这种结构失衡不仅造成生产要素和资源的巨大浪费，降低了国民经济的整体效益，而且成为诱发通货膨胀的重要因

素，对国民经济的稳定发展和政治局势的安定带来恶劣影响。

在中国经济发展中，区域经济发展不均衡，经济差距逐渐扩大是另一个突出的问题。

区域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是多方面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各地区资源条件和自我发展能力的差异，技术进步及其空间扩散，地区间要素流动以及中央区域经济政策的变化，都是有十分重要影响的因素。造成中国区域经济发展不均衡的原因，既有资源分布条件、历史因素、又有国家所采取的区域经济发展战略的变化。

建国以来，我国生产力布局经历了从平衡到不平衡发展战略的大转变，“一五”时期，为推动生产力布局的大规模西移，国家经济布局和投资的重点置于比较落后的中、西部地区。随着内地工业化的推进、国家在内地投资的比重迅速增加，沿海与内地全民基本建设投资的比率（以内地投资为1）从1953年的1.04下降到1957年的0.75。若以人均分享投资或沿海与内地人口的比率作为衡量标准，国家投资地区布局的重点在1958年之后就转移到了内地，特别是在1964—1966年期间，国家投资布局再次向内地大推进，沿海与内地投资之比由0.71剧降到0.38。投资布局的向西推移，对开发中部资源，支援东部地区经济建设和增强国家经济实力起了一定的作用。但是，由于中西部地区、特别是西部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低下，缺乏经济起飞的必要条件，投资效果并不理想。从集中反映经济效益指标的资金利税率来看，东部、中部、西部大约等于4:2:1，这种状况不仅对全国经济发展带动不大，连中西部本身也没有摆脱贫困的境地。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国经济区域发展战略发生了从均衡发展到不均衡的重点突出的发展战略的转变。据统计，“六五”期间东部沿海在国家投资中的比重达到 50.6%，大大超过 1953—1980 年期间 40.6% 的水平，1982 年东、中、西三类地区的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分别为 623.17 亿元、342.21 亿元和 179.78 亿元，分别占全国投资总额的 50.65%、27.8% 和 14.6%；1987 年，三类地区的投资总额分别变为 1974.38 亿元、899.71 亿元和 500.45 亿元，占全国投资总额的比重分别变为 56.12%、25.57% 和 14.2%。在对外开放的过程中，国家在财政、税收、外资、外贸等方面赋予沿海地区以较大的经济自主权，并给予相应的政策优惠，这些因素，形成了从东到西明显的投资、开放、发展梯度，从而加剧了沿海与内地区域经济差距的全面拉大。

近年来，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我国民族自治地方经济也获得了迅速发展，但与其他地区相比，其经济发展却相对滞后，发展水平差异逐年扩大。1979—1990 年，全国工农业总产值年平均增长 10.6%，而少数民族自治地方只有 0.6%，民族自治地方的人均工农业总产值相当于全国平均水平的比例，1982 年为 59.4%，1988 年下降到 46.5%，1990 年又略升到 47.2%，这说明，1982—1988 年间民族自治地方与其他地区间的发展差异在急剧拉大，同时，贫困地区与其它地区间的发展差异也有所扩大。据统计，1985—1988 年，国家重点扶持的 328 个贫困县农村人均社会总产值由 402.3 元上升到 663.6 元，而与全国平均水平的比例却由 50.6% 下降到 45.9%，同时，各贫困地区的经济发展也极不

平衡，东、中、西部贫困地区间的收入差异正在逐渐扩大。

1985—1989年，国家重点扶持的贫困县中，农民家庭年人均纯收入，中部与东部的比例由90%下降到74.3%，西部与东部的比例也由60.5%下降到58%。

1978年以来，国家在投资布局和政策优惠方面对东部沿海地区实行的倾斜政策，明显地拉大了东、中、西部的发展差异，从长期的政策目标取向看，中国区域经济的发展应是非均衡协调发展的道路，即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为保持一定的国民经济增长速度，提高资源配置的效率，国家在资源分配和政策投入上促使沿海地区倾斜发展是十分必要的，但从保持国民经济发展的后劲和不断增加“区域储备”的角度看，这种倾斜必须适度，必须与地区间协调发展相结合，从资源条件和发展潜力来看，在中国90年代以至未来的区域经济开发中，中西部理应受到更多的关注。在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的建议中，十分重视解决地区发展差距问题，把坚持区域经济协调发展，逐步缩小地区发展差距，作为一条重要的方针提出来。建议指出，现阶段地区经济发展的差距在扩大，是一个严重的经济问题，并决定从“九五”开始，逐步加大解决这一问题的力度，从总体部署和经济计划安排方面，国家要更多地考虑支持中西部地区的开发，支持民族地区、贫困地区脱贫致富和经济发展问题，并采取若干重大措施促使这一问题的有效解决。其中包括实行规范的中央财政转移支付制度，以有利于逐步增加对西部民族地区的财政支持和建设投资；优先在中西部地区安排资源开发和基础设施的建设项目，包括鼓励国内外投资者到中西部地区投资；理

顺资源性产品价格体系，以增强西部地区自我发展能力；加快中西部地区改革开放的步伐，引导外资更多地投向中西部地区；通过加强东中西地区之间的经济联合与协作，有步骤地引导发达地区某些资源初级加工和劳动密集型产业向中西部地区转移。可以预见，经过一段时期的艰苦努力，我国区域经济发展的格局和西部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总体面貌，将会有很大的改观。

二 民族地区经济是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

西部民族地区是一个既包括有经济地理学，又包括有政治地理学和民族地理学多方面内容的一个概念。国家在“七五”计划中提出的三大经济区域的划分，属于经济地理学的概念。三大经济区域，是东部沿海地区、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其中，西部地区是指大西北与大西南的山区高原地区，包括陕西、宁夏、甘肃、青海、新疆、四川、贵州、云南、内蒙古、广西、西藏等 11 个省区，在全国的总面积中，西部地区面积大约占 70% 左右，而在西部地区的总面积中，少数民族分布区则又占了 80% 以上。在全国 56 个民族中，聚居在西部地区的就有 39 个少数民族，人口有 4000 多万人。民族地区经济发展实质上也就是西部地区经济发展，本书主要是把“西部民族地区”作为一个经济地理学的概念，从中国经济发展这个整体上，研究西部民族地区作为一个既定的经济区域在国民经济发展中的地位，着重分析西部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和国民经济发展的有机联系，探讨西部民族

地区经济开发过程中带有规律性的东西及其应当采取的合乎客观要求的经济发展战略。

一个国家的生产力布局及其采取的区域经济发展战略无不受客观条件的制约，这些客观条件包括社会经济条件，自然条件和技术条件等，其中，自然条件中的自然资源和社会经济中的人力资源，是创造物质财富的源泉，是生产力布局 and 制定区域经济发展战略的基本条件，正确地、全面地评价西部民族地区的资源分布状况在全国资源分布中的地位，是制定切合实际的区域经济发展战略，协调东西部经济发展的前提。

西部民族地区由于地形复杂，气候多变和水量分布不均，以及地质构造特殊，造就了丰富的地下资源和地上资源。

我国已探明的矿产资源约 140 多种，西部民族地区几乎都有，而且有几十种矿产储量在全国名列前茅，仅西北地区占全国储藏量第一的矿种就有 28 种，有的还居世界前列，具体分布情况如下：

黑色金属矿产有：铁、锰、钒、钛、铬等。新疆铁矿以点多，品位高为其特征，富铁矿约占总储量的 40%，为全国富铁矿平均比例的十倍，除新疆外，青海、甘肃的铁矿储量也较丰富。西南地区铁矿保有储量约占全国 1/5，云南的铁矿保有储量 12.1 亿吨，其中富铁矿占 1/4 以上，西藏的铁矿储量居全国第一，西南地区钒、钛储量占全国的 3/4，贵州的锰铁矿居全国第二，云南锰矿储量也很丰富，其它为发展钢铁工业所需的冶金辅助原料，如石灰石、白云石、耐火材料等资源，西部民族地区均很丰富。

在有色、贵重和稀有金属方面，西部民族地区在全国居首位。

新疆是我国重要稀有贵重金属分布区，其中氧化铍的工业储量占全国 89.22%；锂辉石工业储量为全国的 25.8%；许多稀有金属的产量也居全国前列，如铍精矿和氧化锂均为全国的 100%；绿柱石为全国的 63%，锂精矿是全国的 85.3%；碳酸锂为全国的 76.1%；铌、钽精矿为全国的 39.3%。可以向国外出口的矿石及加工品有绿柱石、锂、钽精矿等 20 余种，镍的储量已居全国第三位，砂金储量也很丰富。

甘肃是我国著名的有色金属之乡，已探明的有色金属、贵金属和稀有金属矿藏达 20 多种。镍、铂、钨、钼、铀、钽、铯、铷、锶、硒、铸型粘土、重晶石等蕴藏量最多，居全国第一；铜和锑居全国第二。

青海探明有工业储量的有色金属矿产也很丰富，其中镁、锂的储量居全国首位，柴达木盆地素有“聚宝盆”之称，有我国最大的现代盐湖型镁锂矿；锡铁山的铅锌矿已探明储量即达 270 万吨，还伴有金、银、锡、锑、铜等 13 种贵重元素。

西南地区是我国有色金属的宝库，汞储量占全国 3/4 以上；铅、锡、铝、锌、锑占全国 1/4 至 1/2 不等；铜、镍也占全国 1/6 左右，云南素称“有色金属王国”，有色金属品种齐全，铜、锡、铅、锌矿的储量居全国首位。现以探明金沙江、澜沧江、怒江等三江地带蕴藏的铅、锌矿产资源，储量居世界第三位。

贵州有色金属、贵重金属资源也很丰富，其中光学水晶

储量居全国首位，汞储量为全国第一，碘、稀土居全国第二位，铅、锰、锑居全国第三位，铅矿品位高，氧化铅含量大，是较理想的富矿，特别是贵州拥有国内少见的特大型重晶石矿床已探明储量为 1 亿多吨，是迄今为止在我国发现的最大重晶石矿床，储量约占已探明的全国重晶石保有储量的 60%，还拥有伴生于铝土矿的镓、伴生于铅锌矿的国内品位最高的锗资源，这些矿产资源，对将来信息、能源和生物等科学研究与产业开发，均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从非金属矿产资源来看，西部民族地区品种齐全，有磷、硫、石灰岩、盐、钾盐、镁盐、石膏、芒硝、天然碱、萤石、水晶、云母、石棉、砷、石墨、石英、玉石、硼、金刚石、硅石以及各种宝石、溴、碘等几十种，蕴藏量十分丰富。川、滇、黔的磷矿储量约占全国的 1/2、云南磷矿开采量占全国 1/3。贵州新探明磷矿储量 1 亿多吨，从而使这个省探明的磷矿富矿储量近 5 亿吨，位居全国第一，占全国已知磷矿富矿储量的一半。川、滇、黔三省的磷铁矿占全国 1/3。西藏的精硼为我国的特产，其硼矿储量居世界第一。

青海的钾盐、镁盐、岩盐、化工石灰岩储量均居全国第一。柴达木盆地盐的储量达 500 亿吨以上，约占全国盐类总储量的一半。湖盐，氯化镁、溴、碘、硼、石棉、天然碱、化工石灰岩等十种矿藏储量居全国之冠。特别是为发展农业生产所急需的钾盐矿，品位高，氯化钾的储量约占全国总储量的 97%，居世界前列。

新疆的钠硝石为全国独有，其它如芒硝、岩盐、自然硫等储量也很可观，硫化碱和元明粉的出口量分别占全国的 50% 和 40%。石棉、长石、陶土和铸石辉绿岩等在全国占

重要地位。其中石棉、白云母储量分别占全国的 40% 和 60%。新疆是我国宝石、玉石资源最丰富的省区之一。现已探明有宝石 9 个类型 26 个品种，玉石 15 个类型 47 个品种。

云南的大理石全国闻名，储量丰富，特别是其中水墨石灰石，是名贵品种之一，四川的非金属矿产资源也很丰富。石棉产量占全国 1/3。

此外，还有一些珍贵、稀有的非金属矿产资源，如云南、青海等地有规模大、质量好、可供电子工业用的压电水晶矿，云南、四川等地有可作净化放射性污染的兰石棉，贵州有生产高精密光学仪器必需的冰州石等。

西部民族地区是我国能源资源最为富饶的地区，能源种类之多，蕴藏量之大，分布之广，是国内其它地区所不能比拟的，西部民族地区各种能源分布情况是：

(1) 水能。西部民族地区的水能资源约占全国水能资源的 80%。全国 10 个大水电基地有 8 个在西部地区，年开发的水能资源达 3.8 亿千瓦，其中，四川省少数民族地区的水能资源理论蕴藏量为 1.5 亿千瓦，年发电量 4.95 亿度，首屈一指，金沙江、雅砻江、大渡河三大水系约占全省水能资源蕴藏量的 66%，可建 1 万千瓦以上的水电站 200 多处，建 100 万千瓦以上的水电站 20 余处，将是我国未来大型水电站分布最多而又集中的地区。西藏可以开发的水能资源有 6000 多万千瓦，居国内第二位，云南有金沙江、澜沧江、怒江、元江和南盘江，经 8 个民族自治州、流域面积广、落差大，可提供 1.04 亿千瓦的发电量。贵州省河川较多，流域面积在 100 平方公里以上的干支流就有 740 多条，水能理论蕴藏量为 1.874 万千瓦，仅次于四川、西藏、云南、新

疆、青海，居全国第六位，单位面积蓄能 108 千瓦/平方公里，名列我国第三，为全国平均 70 千瓦/平方公里的 1.5 倍，为世界平均 37 千瓦/平方公里的 2.9 倍，全省可开发的水能资源已达 1523 万千瓦。西北地区黄河上游的水能资源也很丰富，从青海省龙羊峡起，中经甘肃、到宁夏的青铜峡水电站止，河床全长 918 公里，天然落差 1324 米，可建 15 座梯级水电站，年平均发电最达 500 亿度。新疆共有大小河川 570 条，总径流量 810 亿立方米，已查明的水能资源理论蕴藏量 3355 万千瓦，占全国第四位。

(2) 煤炭。据统计，我国煤碳的理论蕴藏量为 15000 亿吨，探明的储量 7000 多亿吨，仅次于前苏联和美国，居世界第三位。西部民族地区也是煤炭资源富饶的地区，地质部门预测，贵州省煤炭的总储量有 2000 亿吨，不但储量大，分布广，而且产地相对集中，储量在 20 亿吨以上的大型煤田有 7 个。云南省的煤炭储量占全国总储量的 3% 左右，第三纪褐煤蕴藏量有 126 亿多吨，名列前茅。新疆已探明的煤炭资源有 180 亿吨，远景储藏量 1600 亿吨。宁夏的煤炭资源也很可观，从垂深 600 米至 2000 米的煤炭预测蕴藏量达 1914 亿吨，已勘探查明的储量有 308 亿吨，煤质优良，品种齐全。

(3) 石油和天然气。我国现已探明的石油资源就有几十亿吨，居世界第八位，天然气的蕴藏量也不小，相当数量分布在西部民族地区，如新疆的克拉玛依、独山子、准噶尔盆地，甘肃的玉门，青海的柴达木盆地均有油气。石油保有储量，新疆为 53.938 亿吨，青海为 10.928 亿吨，甘肃为 23.804 亿吨，宁夏为 3.823 亿吨。其中，柴达木盆地是我国